

中国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书系

苗族百年实录

(征求意见稿)

(中 册)

《苗族百年实录》编辑委员会 编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苗族百年实录

(征求意见稿)

(中 册)

《苗族百年实录》编辑委员会 编

不屈的抗争精神

姜春台与母冲苗民起义

刘 远 昌

在中国历史上，你可以找不到姜春台，但在苗族的抗争史上，你必须记住姜春台。

近日在翻阅资料中，阅读了《黔西南州兴仁概况》编写组姜国嵩、杨永学二同志收集整理的《姜春台与母冲苗民起义》资料，仔细看来，这场起义不论从人数、规模看，还是从斗争形式、存在时间等看，都不亚于历史上记载的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那场农民起义。史载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的时候人数都没成千上万，而姜春台领导的苗民起义规模最大时人数则是成千上万的；宋江领导的起义前后存在时间还不到三年（1119—1121年），而姜春台领导的起义则长达十年（1921—1930）之久。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写下一笔，不知是历史近了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至今文坛上也没有人对它进行类似《水浒》那样的演绎，只有少数搞地方史的专家学者对它进行了些初步的整理。可见历史难免出现滴漏，现在我国不是在搞西周断代史工程吗？不是准备重修清史吗？为抢救好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笔者对姜春台与母冲起义作个记述，借以就教广大读者。

一

母冲原叫上冲，位居兴仁、贞丰、安龙三县交界有名的龙头大山右侧，到民国十年苗民起义以它为根据地才改名。冲子分为五个冲，即上冲、下冲、降冲、磨冲及贵冲，它们散落在绵延起伏的轿子山和挹斗山的怀抱，上临贵立山，下连马家箐、云盘山和马滚坡，是一个回环相顾的整体。民国初年，整个冲子里住有几百户人家。由于不堪地主恶霸、反动军阀及腐朽政府的剥削和压榨，民国十年（1921），冲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苗民起义，历时十年，涌现了一位杰出的苗族农民起义领袖——姜春台。

考察母冲苗民起义爆发的历史原因，跟历次农民起义一样，是特殊的压迫产生的特殊斗争。它似乎不像古诗描写的“一日三遍打”那样具体，但三座大山的压迫、统治者永无止境的拉兵派款、地主恶霸的高利盘剥等等，则大大超过了古诗描写的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这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皮肉之苦了——人到连死活都顾不过来，“不反待如何”？

二

每次农民起义，都有其相似之处，母冲苗民起义也是如此。

民国十年，各地盗贼横行，匪患甚多，母冲四周官与匪同狼，地主与乡绅同豹。他们敲诈勒索，日偷夜抢，弄得百姓鸡犬不宁。尤其大地主陈伯祥，凭着官府给他手里的“斩杀自由权”，占山为王，鱼肉百姓，剥削民工，滥杀无辜，使方圆几十里百姓

民不聊生。这一年內，他多次上母冲派款，并以派款为名，抢走寨中牛马，逼迫苗民无偿去为他家修建庄园，仅母冲寨里就花去了几百个白工。更让母冲人难忍的是，他们挥动枪和鞭，逼着各族百姓无偿挑粮上离家几百华里的安南（今晴隆），多少挑夫饥寒交迫死于道途，他却不管不问。两年前陈伯祥在母冲境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抢走村里人的财物和牲畜，姜春台曾组织过村里七、八位有胆识的青年暗伏刺丛与他小试过牛刀，可陈伯祥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猖狂。从此，姜春台发誓要跟这个草菅人命不通人性的恶霸拼个你死我活。

乱世年月，怪事犹多。当年传闻：盘县娘娘山出了个“真命天子”，朱国书（苗族）发动苗民“保主登基”，有“金猪玉马”；南笼（今安龙）洒雨地区板烟有对女将（布依族），能踢石门礅为毬、会飞檐走壁、刀枪不入。南笼鲁沟的杨盖州（苗族）带领两千多人直上娘娘山起义，与官家相持了半年多。这些传说和起义，虽对母冲无多大影响，但客观上却激发了各族人民起来与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斗争的豪情。

看到起义时机成熟，姜春台就很快聚集了母冲有胆识者数百人。

凑巧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三月，邻县贞丰有一名官府义士也加入姜春台的起义密谋。他叫余正洪，布依族，是当时贞丰城关区的区长。他与当时称“大臣”的杨正芳（白马山苗族，与母冲姜家有亲戚关系）等精心策划，上演了跟陈胜、吴广起义中“夜篝火、陈胜王”如出一辙的连台戏。策划中他们知道姜春台已聚集了数百人，认为欲成此事，要招集更多人马，非得姜参与不可。因为姜读过书，生性豪爽、行侠仗义，善交朋友，身边人手多。按照他们的精心策划：一方面，杨正芳“大臣”在来母冲的路上捡到了“光滑精致、椭圆、如印、头有字”的“天赐皇印”，并慎重地用红布包好要带去面交“真龙天子”。另一方面，余正洪亦将传说的“天子”请到了母冲（“天子”是从娘娘山败阵下来的朱国书）。“天子”脸上有一个特殊的红印疤，像一个大大的“乙”字，余正洪给乡亲们解释它的与众不同——“乙”就是天下第一，是“天乙贵人”（星相吉神），是“当今的皇帝”（识得内情的人知是被马踢伤后留下的印疤）。更神秘的是到了晚上，“天子”的身体会发光（他每晚躲在姜春台家楼上，用磷火擦身，夜里发出绿光），常引来寨邻青年好奇观望。“天子”在白天常发表一些义正辞严的演说，自称是“明室朱洪武之后裔”，“将拯救民众于水火当中”，提出要“率兵真捣幽燕，九洲共乐尧天”。很长一段时间里，天天有人赶来探望“天子”和听他演说。不久，杨正芳也赶了来，将投奔路途拾到“天赐皇印”之事当着众人反复说，并将“天印”“慎重”地交到“天子”手中。这样一来，整个四月里，“皇帝”、“皇印”之事轰动了母冲及周边地区，也吸引了更多的农民来加盟，一时间集中到母冲的各族百姓竟达六百多人。

五月初，姜春台与各地各路奔来的义士聚集母冲，筹备大事。会议义定，朱国书为“起义所保天子”，杨正芳为“丞相”，姜春台为“起义总统”，杨德明为“副总统”，往下还设有军事秘书长、军需司马及十一名团长，余正洪也立为团长。会议确定起义宣传的口号为：“官逼民款，不得不反！要得不反，除非免款！”起义的旗帜为：“保主

进朝、杀判恶豪”。会期还张贴了“天子”的告示。5月12日，各路起义军同时行动。姜春台本人率千余人马，马蹄阵阵、喇叭声声，他们从母冲出发，分扎巴铃东、西街，一路汇集了更多的布依族、彝族、汉族等各族群众，巴铃绅团闻风缴枪，还供给了起义军一餐费用。5月15日，他们挫败了陈伯祥所率民团的攻击。16日晨，队伍向贞丰县城进发，开到水桥，遭龙场区兵阻击，起义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溃了敌军，占领了龙场，且未伤一兵一卒，并与进入龙场的杨德刚、杨阿昌（巴铃人）领导的起义军汇合。下午，驻守贞丰城的国民党援军赶到，与驻守龙场区的军队共同打击起义队伍，战到天黑，因双方力量悬殊，加之天下起了大雨，客观上制约了起义军土炮、火药枪的威力，起义军被迫分三路向者纳河、三岔河、陈家湾撤退。起义暂告失败，“天子”朱国书也失去了音信。

龙场失败后，姜春台退守母冲。很多人不遣自散，面对可能招致的灾祸，姜春台与战友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前对村里进行了安排。6月初，国民党大山区区长陈伯祥果然纠集官兵约400多人进发母冲，遭到姜春台及其战友姜朝春等五人在离寨较远的罗家湾迎击，他们用“过山鸟枪”和火药枪打得陈伯祥屁滚尿流。掩护村民撤退后，他们就进入深山老林，与敌人周旋。周旋月余之后，姜春台在屯脚的长青被捕，被押送到安龙旧府狱中。关押的时间，母冲人常到安龙街上打听相关消息。一年后，当打听到要120块大洋才能放人，寨邻老幼们硬是七拼八凑，将钱凑够了去保他出来。回到寨中，姜春台一方面向寨邻老幼们揭露了反动政府的腐朽和黑暗，号召人们要继续起来抗争。不久，为继续斗争，他本人流亡了他乡。

流亡后，姜春台先后到晴隆的安谷、安龙的北乡和六马以及广西的纳劳等地区去扩展力量，队伍越拉越大，原来各路起义队伍又多聚集回到他身边。从此，他又在盘江各县组织农民军与反动军阀展开地方游击战。多次与驻盘江八属的军阀杨素平团展开战斗，其中最著名的交战有三次：一次是在小花江依其险势打退了杨素平兵团；一次是在巴铃打退了杨素平兵团；一次在巴铃与杨素平兵团对阵。对阵中，他们将缴获的子弹装入土枪点射，那些子弹在射出时发出剧烈的火光，弄得对方以为他们有什么新式武器，一时几乎不敢战斗。

国民党贵州省府又调派宋醒（绰号宋马刀）为盘八国军团长，以剿匪名义追杀姜春台。由于宋醒采取与地方官吏豪绅相互勾结的办法，大搞间谍活动，逐步瓦解了起义军队伍，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底，姜春台才被抓住并遭杀害。

三

历史已跋涉七十多年，轰轰烈烈的母冲苗民起义时间上早已成了历史，只不过文字上目前还未见历史，这一历史现象不禁引起笔者思索——

研究中国历史，应不应该绕过母冲呢？研究中国民族抗争史，会不会漏掉母冲呢？远古时候苗族的祖先蚩尤跟黄帝、炎帝俩亲家发生过军事冲突，至今还在苗族民间流

转——尽管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去加以记载，但他们凭极好的口耳进行了传唱，更不用说母冲起义了。为此，母冲成了苗族史的宝藏。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的苗族常遭其他民族尤其是反动统治者的歧视，但对历史的不公正，苗族人民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给予了回答。自然，因为斗争，苗族人民不得被迫一次又一次迁徙，甚至流落异国他乡，成了今天分布面广、世界性的民族。母冲也不是自古就有苗族的，他们从外地被迫迁徙而来——成了被迫迁徙这一历史现象的典型例子。在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长期以来母冲苗族人民同其它各族人民一样，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家乡的繁荣昌盛，他们百折不挠，英勇奋斗，谱写了许多动人的篇章。姜春台确实是母冲苗人的骄傲，他领导的这次以苗民为主的农民起义波及面大、影响深远，是苗族的抗争历史上少有的；他以强烈的反抗精神为自己的民族树立了榜样，以感人的事迹为自己的民族作了传。今天母冲埋藏着的故事，仍像珍贵的宝藏，等待并接纳更多的有识之士去挖掘和提炼；母冲起义，也有待历史去加以鉴定和评判。窃以为，将母冲起义摆到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层面去看，也应该是有其地位的；研究中国历史，不应该绕过母冲，研究苗族历史，更不应该绕过母冲，绕过了母冲，历史可能出现滴漏。

最后，我只说：母冲是苗族人民反抗、斗争的一个缩影。

姜春台是苗族优秀儿女的典型。

“辛酉之变”在鲁打

龙吉昌 龙克昌

1921年(辛酉年)秋天，贵州省水城县的龙场乡苗族领袖杨玉清和杨三妹、黎幺妹等人，以水城和盘县交界的娘娘山为据点，组织发动了以苗族为主体的贫苦农民抗暴除恶、反抗压迫、反对剥削、矛头直指土豪恶霸和反动官府的起义，史称“辛酉之变”，也有人称“苗变”。这次起义波及到水城、盘县、威宁、郎岱(现属六枝特区)、安南(现晴隆)等县的广大苗族聚居区。云南省与盘县、威宁接壤的一些县也受到影响。其中安南(现晴隆)县最边远又与水城、郎岱一河之隔的鲁打乡的起义，是由杨玉清直接派人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在鲁打称为“杨家反政”。

这是一次有准备、有组织的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这年鲁打乡遭遇到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几个月未下一滴雨，庄稼全部干死，颗粒无收，众多苗胞靠野菜、草根、树叶充饥，有人饿死、有人逃荒要饭，一直延续到1922年初(鸡年到狗年)，人们称为“鸡荒狗饿年”。此时官府不但想法救济灾民，而是与土豪恶霸互相勾结，派公

差摧交各种苛捐杂税，逼得许多人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广大苗胞度日如年，悲愤的心情难以言表。这时，杨玉清派到鲁打发动起义的杨三妹、杨四妹等人，看到自己同胞忍饥挨饿、遍山寻食的惨景，捐出了自己的钱财，走村串寨，劝说有粮食的富户捐粮救济苗胞，宣传买卖公平、做好事不做坏事、惩罚整人害人的官府和土豪恶霸。她们在苗族同胞中宣传说，眼前我们苗胞遭受的苦难，甚于天灾人祸，大家要明白真相，分清是非，团结起来，用武力推翻反动官府，打倒土豪恶霸，夺富济贫，广大穷苦苗民才会过上好日子。

她们的宣传深得人心、广大苗胞感到非常振奋，视她们为亲人、姐妹，对她的主张表示支持、拥护。主动要求她们带领大家向官府讨回公道。杨三妹、杨四妹等人看到广大苗族群众已经觉醒，举事条件基本成熟，便召集骨干分子商议起义事宜，推选出家住高山村、多人拥护的、人称“刘百长”的刘祚能为总指挥；以晚清贡生人称“贡爷”的家住包包村龙玉池（字灿奎）为“师爷”；以及洼子村龙子云、寨榜村龙云斋、坟山村李成良、李成贤和中云村埔戛村胡宪清、胡小清等人为骨干。指挥部设在龙玉池家。苗民有了领头，便大胆地肩扛火枪，手提梭标公开与摧交捐税的官差作对，将他们轰出鲁打。南安县长得知官差的报告后，惊恐万状，经过几天的秘谋策划，决定派兵前往镇压。义军打探到官府派兵来犯，便组织数百人手持梭标、火枪前往阻击。队伍走到20多里的小红寨一带，便与官军遭遇，义军土生土长，地形熟悉，火枪用得熟，交战时边走边装火药、砂子，走三步打两枪，铁砂子打一片，有一定的杀伤力，打得官军东躲西藏。经过一昼夜的交火，官军受到重创。义军士气大振，正准备发起冲锋时，突然下起小雨，义军的火药受潮，威力大减。火枪的“秘密”暴露以后，官军反扑过来，双方短兵相接，互有伤亡。义军失去优势，边打边撤，直退到离指挥部一里多路的双枣村和太平岩两条狭窄路口坚守，这两条路口是阻击官军进攻必经之路，要从山脚的步洽河爬上来，有数百米之高的崎岖小道，左右均是悬岩绝壁，十分险要。官军每天轮番进攻，都被义军居高临下用木头石块击退，无计可施。义军坚守月余，有些松懈，官军久攻不下，便派人四处打探上山之路，终于在步洽河边找到一家人，经过软硬兼施，胁迫，逼使男青年趁夜深摸到岩脚，找到一条岩缝攀藤爬上悬岩，从背后偷袭，与此同时官军从正面也发起了攻击，使义军措手不及，伤亡较大，义军的抗击时终因腹背受敌，兵力分散，难以阻挡，两个险要路口失守，指挥部组织增援来不及，只好坚守不出。坐镇指挥的杨三妹、杨四妹、龙玉池、刘祚能等义军首领，见官军来势凶猛、武器精良，一时难以组织有效的抗击，趁午夜官军不备，派人出寨偷袭成功，稳住官军后，便带领队伍从后山撤退，分散离开鲁打。天亮官军攻寨，发觉义军已无影踪，便挨家挨户掠夺财物、牲口，最后官军还纵火焚烧了包包村几十户人家的住房，周围十几个村寨也遭到一场空前洗劫。

鲁打“杨家反政”，历时半年多，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政府的残暴统治，灭了反动统治的威风，大长了鲁打苗族人民的志气。当时安南

县政府的官员，一提到“杨家反政”，就不寒而栗。只好每年派保划士警兵到鲁打为一些有名望的苗族首领打田插秧并赠送礼物，以稳住苗族人民的反抗情绪，暂时缓和一下尖锐的民族矛盾。但鲁打苗族人民的反抗却未中止，相继的抗暴斗争，仍然是此起彼伏，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目睹这次起义经过，苗族龙美川先生写有一首词《西江月调·作杨玉清榜样》：

民国辛酉大乱，玉清造反为王，招兵买马想贵阳，保主娘娘山上。

扰动颠黔壮盛，人马纷纷颠狂，闻听血水已成江，大娃小女命丧。

转至岱属出阵，调拢八方帮忙，红旗绕绕实难挡，惹动安南府上。

县长除邪立正，镇守县属乡邦，杨军雄兵似虎狼，四处房屋伴。

广西融水苗族人民抗争史略

廖清立

滚育兴聚众斗匪霸

民国十二年（农历癸亥年 1923 年）农历二月初产，拱洞河流域暴发以滚育兴、贾亭恩、韦老宁、石育协为首的苗族武装抗暴斗争，斗争矛头直指地主匪霸。他们聚集当地百姓数千人在振民村“埋岩”饮血，立规约，四出追杀地主匪霸。北面两次打到贵州省从江县的下江和西山；东面多次打到大对岸和下游的高安村和良口岭头；西面打到中寨乡的河村、洋洞。各地的地主恶霸惊恐万状，纷纷四处奔逃。一时间，整个北部山区都在苗族抗暴队伍的武装控制之下。从 3 月 1 日至 4 月初，苗兵浴血奋战 33 个昼夜，地主匪霸武装深受重创，死伤 200 余人。到民国 14 年李宗仁统一广西、建立乡村保甲制度后，贵州分同、增诺一带的苗民武装被民国当局围剿，滚育兴失去依靠，百余苗兵被迫解散。7 年之后，滚育兴从外地回高文村后被逮捕，随即被押送三江县政府，关押致死。

贾老喜“埋岩”反“三征”

民国二十三年（农历甲戌年 1934 年），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加紧内占，强化征兵、征粮、征税（统称“三征”），将数不尽的兵役、差役和苛捐杂税一次又一次地强加在各族人民身上。各种捐税名目繁多，民众称之为“万般皆有税，唯有屁无捐”。当局以征兵为名，搜刮民财，索取“壮丁费”、“壮丁安家费”等。这年，融县政府下令征 16 至 45 岁的壮丁去当兵，50 岁以上者服从差役。苗族同胞对此十分不满，四安乡雨蒲村寨捞屯强烈抵制，融县当局派出议长江云渠，议员廖文智带领 40 多名军警到寨捞屯，宣布免去贾老喜副村长之职并准备予以逮捕。老喜是寨捞

屯自然领袖，见来者不善，早已躲开。江云渠抓走了贾老喜的儿子贾文隆和村长贾桥补，以此要挟贾老喜投案自首。

老喜走投无路，盛怒之下，振臂号召寨捞苗族群众反抗。他派人往元宝山周围的培秀、小统、高王、荣塘、荣地、岩板、乌涌、乌吉、吉曼等村寨进行串连，约定寨捞屯的“行散”地方举行“埋岩”大会。会上经过协商，由贾老喜宣布几项决定：第一、各村寨统一行动，同抗“三征”，要粮税不给，要人当兵不去，如抓人就和他们拼；第二、各村寨分兵把卡，严阵以待，团结一致，互相支援；第三、各家各户备好土枪，随召随到；第四、给敌人通风透气、充当奸细或临阵脱逃者，斩首示众；第五、坚壁清野，将老弱病残者及家禽、牲畜疏散进山；第六、统一指挥，牛角号不响不开枪。会上，杀猪分串肉，共饮血酒明誓，以示同心同德，生死与共。会后，各村寨头人，代表去发动群众，加强防范，听候命令。捞动前沿，首当其中。村民在贾老喜的领导下，利用背靠元宝山，前临悬崖陡壁，山径崎岖的有利地形，设置防哨，日夜派人监守。在滚牛坡、桃子坳设置滚木擂石，作为第一道防线，于村要设第二防线，贾老喜则在便于观察的山头上设临时指挥所。拟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上元宝山与敌周旋。

贾老喜“埋岩”起事，被督练张德甫秘密侦悉，当即连夜向融县政府报告，当局令张德甫率民团特编队一百多人前往镇压。特编队兵分两路逼近寨捞。一路从中平沿山梁从正面进攻，一路从道茅小路偷袭。当正面一路接近滚牛坡时，守卡苗民砍断吊藤，顿时滚木滚滚而下，砸得团丁乱作一团，不敢前进。张德甫见势不妙，下马换装，混在土兵中。贾老喜沉着应战，待茅坪一线之敌靠近村边，一声令下，牛角声、枪声四起，当场打死1人，追击又活捉2人，张德甫见大势已去，只好收兵逃回香粉。

寨捞苗民挫败了民团的第一次进攻，人心大振，贾老喜不敢松懈，继续发动群众，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坚壁清理，连楼板都拆下藏起来只留下空寨子。事隔八九天，国民党驻融县第五管理区司令黄敬修、参谋李旭奉命率4个中队和一个机枪连开赴蒲令，扬言要把寨捞杀个鸡不留。他们强迫村民当捐夫和带路，一路鸣枪打炮，进行恐吓。贾老喜见敌势凶猛，指挥群众散进山隐蔽。黄等见抓不到人，又抢不到东西，恼羞成怒，火烧寨捞后撤离。寨子被烧后，人心涣散。国民党融县当局强令寨捞苗民赔偿损失，勒索钱财。寨捞苗民为谋求生存，忍饥寒，凑足120多块银元上缴乡政府，此事才算了结。贾老喜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带着一家老少远走贵州从江县，半年后才悄悄回到寨子附近的深山老木居住。轰轰烈烈的一场反抗斗争终于失败。

杆洞地区人民反压榨暴动

十八年（农历己卯年公元1939年）国民党派在杆洞地区的官员，对这个地区的人民群众敲诈勒索，为所欲为，杆洞地区人民忍无可忍，便组织起来，进行反压榨暴动，此事震动了全省。国民党保安司令调动了5000人枪的队伍向这个地区进击，双方经一周时间的战斗，杆洞人民终因枪劣弹尽，暴动而告失败。

苗侗联手抗官兵

民国三十三年（农历甲申年 1944 年）11 月 20 日，日军百余人强渡融江，国民党驻军 93 军未做抵抗即逃入贝江。

贝江流域广大山区为苗、侗族聚居地，平日过重苛捐杂税。已使他们苦不堪言，这时大批军队，伤兵、难民和机关学校涌入，更增加了人民生活上的困难。这批 4 万余人的大部队，不但驱使乡、村长催捐逼税，还强买强要，敲诈勒索，尤以 93 军为甚，军民对立情绪十分严重。

是年 11 月 23 日，国民党军一部在荣地征粮，敲诈村民。潘春华为首带领村民反抗，当晚村民割电线，设路障，在山上布哨。次日 9 时许，国民党军征粮武装人员在小学球场召开民众大会，早有准备的青壮年突然拔了刀剑，加在 20 多名国军颈上，顿时四处枪声骤起，山头火烟冲天，国民党军慌了手脚，放下武器，跪地求饶。村民痛斥国民党军的罪行，归还武器，把他们轰出村子。

国民党军驻马鞍底团部队对此大为震惊，立即把驻扎在马鞍底、田头口一带的 700 余名国军调到东江集结，意欲对荣地实行征讨。东江苗族群众秘密向荣地报信，潘春华一面疏散人畜，一面以鸡毛辣椒信向四邻求援。高王屯贾建忠、翁牛屯梁志连首先响应，接着元宝山、小桑、培秀、雨卜、茅坪、寨捞、吉曼及良双、良陇等苗族村寨声援。农历 10 月 17 日，名寨首领在荣地附近老山冲里秘密开会，决定各村各寨团结一致，实行武装自卫。农历 10 月 22 日，集结到荣地的群众武装队伍达 700 多人，分散在荣地周围的尚有数千余众。苗侗群众在芦竹球状上举行“埋岩”仪式，共饮血酒盟誓。是日从早到晚，整个荣地牛角号声嘟嘟不停，枪声不断。他们声言，要国民党军出山去打日本人，不许在山里横行。国民党军虽然人多武器好，但众怒难犯，不敢轻举妄动。相持了 10 多天后，国民党军终于朝贵州方向撤走了。

湘西苗族革屯运动

刘善述

一、“屯政”的残酷统治

清王朝镇压了湘黔边境苗民“乾嘉起义”以后，为了彻底根绝苗族人民的反抗，在“苗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起用凤凰厅同知傅鼐“总理边务”，在湘西举办“屯政”，以加强对苗族人民的控制和防范。

“屯田”制度的施行，苗族人民世代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土被掠夺归官了，以后不得不向官府承佃田土，忍痛交纳“屯租”。开初“田租一亩一石，土租二斗”，共

计“岁征租十万五千四百八十八石三斗九升”，后由于群众反抗，租额有所豁减，道光元年，“实征租谷七万九千二百一十石三斗九升”。从此以后，“永为定额”，颁发承种佃户执照，按额催征。即使大灾之年也不豁减，叫“荒田不荒粮”。有屯7县共建“屯仓”126所，由“屯长”及屯务人员负责看管。屯租剥削量要比屯田以前的赋税粮“增加200余倍”。这是就有屯各县的一般情况而言，而其中苗族人民的境遇更惨，因“苗疆屯田，民佃不及十分之一，余俱苗佃，岁输租籽，为屯防一岁经费之需。”按规定的租额，平均至少也在收获量的50%以上。除此以外，经屯人员还百般敲诈，如送租上仓时，车谷的人用力猛车，随风抛落在地上的“地皮谷”，量斗时从斗尖上掉下来落在量斗人周围的“裤裆谷”等，都为屯务人员所得，佃户何敢异议，交1担租，起码实付1.2担。苗家人民苦不堪言。

进入民国以后，1921年陈渠珍出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兼屯务处长，总揽屯务，“屯田养勇以防苗”的原意虽不存在，但他一直把屯租看作是整军兴武，割据湘西的经济基础，顽固坚持屯防制度，将“营屯子弟”作兵源，“屯田岁收”作饷源，以维护其湘西的霸业。陈虽数改官职，但一直沿袭旧章征收屯租。更有甚者，陈渠珍势力扩大以后，法随自主，令由己出，遂以1票田定价60串钱变卖，“发还”丁户，永为世业，仍同往常一样不纳租课税。这样一来，顶拨屯租田土的越来越多，出现一批屯田地主。他们多将佃种田土转佃给农民耕种，从中加抽地租。因此，苗民屯户既要受政府的苛租重税压榨，又要受地主盘剥，弄得民不聊生。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也不得不承认“自傅鼐设屯分防，至今二百年（时间有误），积久生弊，毋庸讳饰。逮人民国，时变纷纭，未遑整理。盖以兵灾匪患，边境之民，良懦者痛苦莫陈，桀黠者梗化日甚。”“一般收租官吏，因距省府较远，交通不便，陋习相沿，巧立名目，以为剥削苗民之计”。

1936年8月，余范传继陈渠珍任屯务处长以后，也感到屯田问题严重，“查有屯各县，土地硗瘠，生产力薄，迩来农村凋敝，物价高昂，贫民生活极为困窘……民性纵属纯良，饥寒因多思乱”。他曾拟定了《湘西屯务改革维持纲要》，提出改革屯务，但他仍认为湘西屯防制度“立法虽善”，只是“守法不严”，所以他提出“屯区设立屯租征收局”，直接为省政府办理屯租征收、解拨、保管和清查屯区田土。他的所谓改革完全在于加强屯政的残酷统治，这就成为湘西苗区人民起来革屯之原因。

二、“革屯”永绥首义之原因

1936年至1938年的湘西革屯运动之所以首先在永绥发起，成为这次运动的突破口，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上述之背景外，还有如下原因：

第一、屯租剥削较之其他各县为重。永绥是纯苗区，在乾嘉苗民大起义中反抗压迫最力，是受打击最重之地。所以清政府在推行屯防制度时，永绥便成为重点，查抄叛占田土很多，以此来挫辱苗民锐气，以防“再反”。永绥一厅当时的归公田土共80063亩，即占湘西屯田总数的一半；到民国，何键也承认：“屯田制度，积弊甚深，久为民

病，永绥一县犹为痛苦”。该县龙潭地区自 1934 年至 1936 年连遭水旱灾害，尤其是 1935 年的旱灾为百年来所未见，一个不满百户的小寨土地坪就饿死 30 多人。但官府仍以“荒田不荒粮”为借口，照常催征屯租。“因此，1 年之中，苗人为租谷，逼成投河吊颈自寻死路者之案，不计其数。老弱填于沟壑，少壮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龙潭苗族人民首举武装革屯的义旗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受历史上革屯和革命斗争的影响较深，永绥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之地，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过去曾称“三不管”地区。在这里爆发革命斗争，可以得到邻省边区群众的支持和响应，便于攻守。据现掌握的不完全资料统计，自嘉庆以后发生的大小 10 次反屯斗争，几乎无一不与永绥相关。其中有 6 次起于永绥或永绥直接响应。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以乾州苗民石观保、永绥苗民孙文明等‘款首’为领导，掀起了席卷乾、永、凤三厅的“伙款”抗屯大起义，分屯谷，烧屯仓，清政府不得不决定将 7 厅县自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的欠租“概行豁免”，将二十七年的欠租 2.950 万余石缓至二十九年底，分三年“带征”。这一印象在永绥人民的心目中是难以磨灭的。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北伐战争前夕深入到湘西，到这里播下了农民运动的火种。1927 年夏，共产党员喻德高来到永绥，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斗争，提出推翻屯防，打倒屯租的口号，并带领群众驱逐催租人员。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未达目的，但给苗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9 年至 1935 年，夏羲、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鄂、川、黔边区。1934 年 7 月，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下，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在永绥毗邻的沿河召开，并且作出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指出：“对于位居在贵州、湖南、四川境内之苗族，决定以全力帮助他们得到解放和自由”。“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和国家的土地（如屯田），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同年 12 月，红二、六军团建立了以永顺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在与永绥交界的保靖县普戎、龙溪、昂洞等地创建了苏维埃政权，发动农民反封建剥削，进行土地革命。这些革命斗争在永绥播下了火种。

第三，陈渠珍与宋濂泉的矛盾冲突，是这次革屯运动首义于永绥的直接原因。宋濂泉原是永绥屯务军指挥，叔侄两代经营永绥屯务，控制永绥大权；湘西军阀陈渠珍，自专任屯务处长以后，想独霸屯租，借整编为名，免去宋濂泉屯务指挥的职务，1936 年，陈渠珍在乾城召开了有屯 7 县县长参加的屯务委员会会议，并派出屯军赴永绥武装“催征积年尾欠，并预征当年冬粮和第二年的租谷”，致使“绥民求生不得”。

宋濂泉面对陈渠珍的步步进逼，便利用群众抗租的不满情绪，召集旧部和全县乡镇武装及边邻杆子队伍 1,000 多人，组成反陈抗屯军，1936 年 6 月 24 日，迎战陈渠珍派来的催租部队于永绥麻栗场，史称“永绥事变”，这就是 1936 年湘西革屯运动的前奏。

陈、宋双方武装冲突发生后，何键和国民党二十八军军长兼沅陵绥靖主任陶广，唯恐陈渠珍势力扩大对己不利，暗助宋濂泉，电令双方停止攻击，陈渠珍才不得不下令所属屯军刘鹤卿部撤离永绥。宋濂泉立即采取主动，又从政治上对陈渠珍施加压力，以兵逼县府召开全县区乡长、公法团及城乡士绅代表 300 余人开会，组织“永绥县解除屯租诉愿团”，并通过“宣言”派出代表 12 名，以永绥县各法团请愿代表的身份，持“邀恳政府改租为粮，以跻平等事”的呈禀，递呈专署、省府。将呈禀铅印叫“快邮代电”，连同“宣言”一起广为散发，争取社会舆论支持和同情“抗陈抗租”。《宣言》和《代电》列举了屯政的种种罪状，提出了“废屯升科”和民族平等的要求，可是 12 名代表中，苗族竟无一人参与，何能谈得上是苗民诉愿。故《大公报》报导：“目前要求之发生，适在宋氏兄弟异动终了之时……不先不后，内幕可知，”此议对宋濂泉不利，于是宋濂泉礼请有政治声望的苗族知识分子吴恒良出任诉愿团主任，以摆脱师出无名的被动局面。

永绥事变，虽然是陈、宋矛盾的结果，但是斗争的胜利却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租情绪，而宋濂泉也想借群众抗屯之势，在永绥恢复权势，并继续以反陈相号召支持吴恒良、梁明元领导抗租。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革屯抗租运动即应运而生。

三、革屯运动的经过

湘西革屯运动，从 1936 年 6 月 24 日“永绥事变”，到 1938 年 3 月 9 日省府常会批准《六条办法》，决定“废屯升科”，革屯运动取得完满胜利，共历时 1 年零 9 个月，大致经历了这样 3 个阶段：

（一）诉愿斗争阶段。瓦水苗民吴恒良就任“诉愿团”主任以后，立即物色唐家湾苗民知识青年隆子雍作助手，一同开展工作。这个诉愿团是各个阶层联合阵线的组织形式，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因而要求革屯抗租的目的也不尽一致。

宋濂泉是独霸永绥的一大势力，他所谓抗租主要是“抗陈”，与陈渠珍争权。吴恒良属苗民中的上层，当过小学校长，且曾任过副官、参谋、团副等职，是宋濂泉请出来的，紧跟宋濂泉。

隆子雍家是 1,000 多担谷子的屯田地主，每年要交几百担谷子的屯租。他要求抗租，一是在外读书，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感染，二是解除屯租直接与他的切身利益有关。

由于这些人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一方面他们要借助群众的革屯抗租力量“抗陈抗租”；另一方面，他们不想彻底革屯，因而使这阶段的革屯运动出现了一种和平诉愿的方式。

陈渠珍并不因武装督催屯租失败而罢休，当革屯转入和平诉愿以后，便以“年远代湮，转相承种，还之旧田产主，则茫无稽考，授之现时耕者，不独以贱价获重利，失之平允，而百余年来，一田已十易其主，辗转顶替，势必因一田而引起 10 余人之争执”为由，反对“废屯升科”。

何键、陶广为了钳制陈渠珍势力的发展，同时在群众革屯抗租的强大压力下，于

7月25日公布了《永绥事件善后办法》，规定“屯租积欠，暂停征收”，“事变曲直，俟派员查实”；同时省府借解决“永绥事变”之名，“乃去陈而以余（指时任屯务处副处长余范传）继任”。在宋、陈、何之间矛盾交织，上下相逼，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陈渠珍辞去屯务处长职务，赴省就任长沙绥靖公署总参议之虚职，这就为群众在“革屯”的道路上搬掉了一块绊脚石，也是革屯斗争的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永绥各阶层人民革屯斗争的信心。

8月1日，余范传在乾城宣布就职以后，在何键的支持下，一切沿袭屯田旧制同时引诱宋濂泉离境“为省府参议”，以便瓦解“诉愿团”。他以为如此，便可以左右一切，为所欲为。吴恒良、隆子雍识破了余的阴谋，于8月16日召开了诉愿团代表大会，研究对付余范传坚持征租的政治形势。19日作出四项决定：警告余范传“勿再以固有手续施于绥民”，重蹈陈渠珍的覆辙，“以免纠纷”。并派出能言善辩的隆子雍和县城汉民向备三持呈赴省上诉。同时，吴恒良和隆子雍还深入到上下五乡，上下八乡和上六乡等村寨，召集小型屯户代表会议，商量对付催租办法。

余范传得此消息之后，欲置诉愿团于死地。10月中旬在“出巡”永绥时命令取消诉愿团，强行停止一切活动，“并将缴图戳”；声称“二十五年新租，照章缴纳”，限令“阳历11月15日止，缴足三分之二，12月15日止全数缴齐”；调亲信李卧南接替征租不力的县长刘慕唐。12月1日，李卧南到任后，以省府“废屯升科暂从绥议”的布告为护身符，声言要“缉拿暗中唆使、仍敢抗租之捣乱分子。”

在保屯势力的高压下，抗租阵线动摇，苗备弁、区乡长中出现贪功催租的，屯户中也有怕事交租的，和平诉愿最终归于失败。

（二）武装革屯阶段。虽然和平诉愿失败了，但是经过前一段的宣传发动，废屯的要求深入人心；同时“事经数月”的诉愿实践，使他们认识到“阻于贪污”，和平“恳求改革”是不能如愿的；特别是贫苦的苗民兄弟之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走上武装革屯的道路。

上六乡苗守备石达轩一贯仗势催租，“罔恤民艰”，积怨甚深，群众恨之入骨。1937年1月26日，永绥蚂蝗塘苗民石维桢，趁石达轩向屯户逼租之际，邀约了6名青壮年屯户，杀死了作恶多端的石达轩及催租仓兵4名，打开屯仓，把租谷分给贫苦百姓后，放火烧了屯仓，捣毁了区公所，抗击屯务军，在龙潭首先举起了武装革屯的义旗。

继龙潭事变之后，龙正波邀约苗民去烧铅藏的屯仓；龙云超烧了扫所寨的屯仓；鸭堡寨汉民崔寿卿和新寨汉民邓世弟分别烧了董马和尖岩的屯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木沟寨苗民梁明元在长潭揭竿而起。

梁明元，家境寒苦，深知民间疾苦，早对屯租剥削存恨在心。龙潭杀官起事，他积极支持和响应，在群众中宣传“龙潭人是逼上梁山，人急走险”，“龙潭人抗得，我们也抗得”，积极组织长潭人民起来抗租。1937年3月4日，梁明元便率盟誓兄弟8人在长潭起事，杀死下七乡乡长常键，夺取了乡警的长短枪12支，打开窝勺、下寨、

长潭三所屯仓，把屯谷挑光以后，放火烧了屯仓。群众大为开心，并编歌称颂：“下七出了英雄汉，木沟名声远远扬，常键好比田中稗，杀死乡长稗除光；乡长骡子赶出骑，骑上骡子烧屯仓，梁明元烧仓干大事，三十三寨都来帮，大家齐心好免粮。”

石维桢知道长潭起事以后，立即与梁明元结盟拜把，表示联合起来，一起革屯，革屯队伍发展到了300多人，建立了革屯武装。梁明元被推为大队长，石维桢为副大队长；吴恒良、隆子雍通过和平诉愿的教训，也同革屯军“结盟”，走上了武装革屯的道路。

1月26日，龙潭地区人民起来杀屯官，烧屯仓，抗屯租，体现了苗民革屯的意愿，拉开了湘西苗民武装革屯的序幕，是苗民革屯运动由和平诉愿到武装斗争的转折点。

何键得报苗民屯户“公然暴动起来，杀人烧仓，破坏电线，围抗官军，接二连三闯出大祸”，3月27日，便派省军六十二师一六八旅一个营前往弹压，包围了隆子雍的家，并抢走其财物，屠杀了7名无辜良民，龙正波父母惨遭杀害，邓世弟的母亲和妻子也被关押起来。尔后连下两道通缉令，对吴恒良、隆子雍、梁明元、石维桢、龙正波等9名“首犯”和崔寿卿等38名“次要犯”，“悬赏缉拿”，“提充匪产”；在各村寨建碉筑卡，监视苗民行动，施行恐怖政策。在此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梁明元、石维桢等革屯军领导人被迫率部“扒山”，他们采取避实就虚，化整为零等策略，继续坚持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何键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压力，将镇压革屯运动的省军撤出湘西。梁明元立即在永绥、保靖两县交界之谷坡恢复革屯军，重建革屯军指挥部，并将革屯军命名为“湘西苗民抗日革屯军”。于是“登高一呼，万山皆应，旌旗所指，屯毒潜消”，群众纷纷起来响应，进占了保靖县的水田、葫芦、夯沙等苗乡，逐屯官，烧屯仓，抗屯租，很快形成了以谷坡为中心的绥、保、乾、古边界连成一片的革屯区域，队伍发展到了2,000多人。后又由吴恒良出面，整编革屯军，打出“湘川黔革屯抗日军”的牌子，吴恒良任总指挥，隆子雍为副总指挥，梁明元为前敌指挥。8月17日，保靖县长姜干向省、专告急：革屯军“乘六十二师覃营移防以后，卷土重来，势焰复炽”。

正在这时，湖南的“倒何帮”也活跃起来，他们趁何军东调，无能西顾，革屯军又“势焰复炽”的大好时机，也打出“革屯”的旗号，在凤凰、麻阳等屯田县掀起了武装斗争的浪潮。

首先是受何键排挤的陈渠珍势力图谋再起，他们同国民党的湖南CC派张炯等联合，在汉口密商“倒何”方案；CC系从内线勾通蒋介石；龙云飞、杨光耀搞武装扰乱湘西，给蒋制造“撤何”口实。

龙云飞是凤凰总兵营（今山江）苗民，其时正为何键“清匪挤枪”所逼，寻找出路，因此一拍即合。他汇合了凤凰县苗民龙和清、龙清福、土家族田儒礼等土著武装和革屯群众，9月8日，攻占了湖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乾城，直

到9月27日退出，龙云飞入城后，宣布成立“抗日革屯倒何义勇军”，龙任总指挥，杨光耀为副总指挥。提出“抗日”、“革屯”、“倒何”三大口号。龙云飞的目的，虽在“倒何”，但由于打着“革屯”的旗号，占领了乾城，壮大了革屯军的声威，客观上促进了革屯运动的发展。因而得到了革屯民众的支持。

在龙云飞起事的同时，麻阳义勇总队副龙杰紧密配合，以奉省令为名，占领了麻阳县城，成立了“倒何抗日抗屯义勇军”。

9月28日，梁明元趁龙云飞、龙杰攻陷乾、麻的大好形势，集中永绥、保靖、秀山、松桃等边区县大小20来支革屯军约1,000多人，任命龙焕云、李安江、石兴顺等为前线指挥，围攻保靖县城1天1夜。

1937年9月，各路“革屯”军风起云涌，席卷了湘川黔边区各县城乡，革屯运动达到了高潮，使反动保屯势力惶恐不安，正如保靖县长姜干急电何键哀号那样：“龙云飞、吴恒良、梁明元等勾结湘川黔边境土匪，好乱称兵，同时并举，攻陷乾麻，扰乱绥保……瞻念前途，杞忧弥切”。

在何键已无法控制湘西局势的情况下，9月24日，余范传被迫呈请辞职；蒋介石亦“电令将原调往前线之军队，停止开拔，协助剿匪”；何键也加派军警进剿，并悬赏“击毙龙云飞、吴恒良、梁明元者奖金五百元”，还致电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请求派遣“秀、酉军警会剿”。

（三）1937年10月，革屯运动进入和平谈判阶段。在军事镇压的同时，何键又采取了另一手策略，即进行了“招抚”，以分化瓦解革屯军，达到其继续控制湘西的目的。

乾城事变后，何键派省保安处上校副员陈策勋来湘西进行宣抚，千方百计拉拢吴恒良，以动摇革屯联合阵线。吴恒良认为余范传等保屯官吏已经去职，革屯势力日渐发展，可以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协商，于是便以革屯军总指挥名义向陈策勋递呈“陈词”，请陈转呈何键。在“陈词”中提出两项条件：“首先改屯升科，期得共享平等待遇之幸福，次则将原集请愿之武装民兵4,000余人，请于屯租改革后，予以编定，从事整训，俾得向国家觅一努力途径，尽人民一分子责任。”

何键得呈后，遂派胡锦心为永绥县新任县长，作为政府代表，与革屯军代表具体磋商。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大小军阀之间的复杂矛盾互相交织，谈判不得要领，解决不了湘西的安定问题。

蒋介石对何键在湘搞“独主王国”十分不满，加上CC派从中拨弄，便以湘西暴动为名，指责何键“治湘无方”，把何键调离湖南，派张治中接任湖南省主席。

张治中来湘以后，对革屯运动采取了一些比较明智的政策。1938年1月12日，通令取消何键发布的通缉吴恒良等人的通缉令；1月22日，邀请有屯7县派代表进省协商解决屯租问题，最后达成解决屯租的《六条办法》，省府承认了“废屯升科”的基本原则；3月1日，正式宣布裁撤“湖南省屯租征收局”；3月9日，省府常会追认《六